

学林漫錄

十一集



学林漫录

十一集

中华书局

封面题签 赵朴初
封面设计 谈冰玉
编辑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学林漫录

十一集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8印张· 187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数 6401—9400 册 定价：12.00 元

ISBN 7-101-01741-X/I·294

目 录

(7&1) 李 玉	二五林华文蕃魯山——
(8&1) 韶峰翁	李廷輝著大司馬《五掌堂草齋圖》
	其藝與我同文——《志慕公容軒墨表蔚光》宋晏
(9&1) 鮑夫揚	勤角
(10&1) 張蘇官	翰白分洪曲盡字文
(8&1) 喻嘉祚、吳	言未不諱
因一多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郭良夫 (1)
沈尹默與章士釗	江 东 (10)
記呂思勉先生	庄 嵩 (16)
薪盡火傳憶我師	
——紀念羅膺中先生	鄭臨川 (29)
書崇禎來欽之刊陳洪綬繪插圖本《楚辭》后	
	李一氓 (37)
王重民和《徐氏庖言》	劉脩業 (43)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提要	王利器 (48)
舊書瑣記	黃永年 (55)
汪辟疆先生論詩語錄	程千帆輯校 (71)
說賦	韓兆琦 (82)
李白與唐肅宗	薛天緯 (86)
樂天詩藝術五弊	趙仁珪 (99)
關於杜牧的“長兄”	凌家民 (107)
談皇甫謐的《列女傳》	魏明安 (112)
談敦煌本《启顏錄》	張鴻勛 (120)
讀《虬髯客傳》札記	王運熙 (130)

高昌佛祠向佛寺的演变

- 吐鲁番文书札记二 王 素 (137)
《阅微草堂笔记》所录任大椿轶事考 任祖镛 (143)
晏殊《光禄寺丞仲容公墓志》一文的发现及其
 价值 谢先模 (150)
文字最多的元代白话碑 官桂铨 (154)
枥下杂言 关 朴遗作 (158)
秋瑾入湘 黄品兰 (165)
坚净居随笔 启 功 (171)
跋明张璁书扇 唐长孺 (177)
艺苑丛谈 刘叶秋 (185)
莎斋论书法文字辑存 吴小如 (192)
文园书画题记 陈祖范 (200)
画史析疑二题 胡 艺 (207)
萍斋书画札 李铁匠 (210)
川剧《拉郎配》史实考 郭松义 (217)
《红楼梦》服装杂说 邓云乡 (226)
梦华札记 孔宪易 (234)
“椎牛”及其他 刘法绥 (240)
论“窗”与“牖”名词使用的变迁 杨 寒 (245)

因一多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郭 良 夫

鲁迅先生临终前两天，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我这题目是套用鲁迅先生的。

关于一多先生，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解放前写的《闻一多与联大新诗社》，登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日出版的《北平诗联丛刊》上面。另一篇是大前年写的《怀念我的老师》，收在一九八〇年八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闻一多纪念文集》里面。

一九三六年秋，赵太侔接替严智开来当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赵太侔邀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先生到艺专来兼课，讲授英语。当时我在艺专学雕塑，选了英语课，开始认识先生，直到一九四六年先生为民主而献身，我追随先生有十年之久。

“先生来艺专，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在民十四，到现在已是整整十年。”（《年谱》）一九二五年五月，先生和余上沅、赵太侔同船从美国返国。同年暑期过后，先生和余上沅、赵太侔同到北京主持艺术专科学校，先生任教务长。

余上沅，一九三九年，在四川江安县，我和他见过一面。那时他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我在江安县立女中教书。仅此一面。谈不到对他有什么认识。赵太侔是我们的校长，算是比较熟的，可是赵这个人沉默寡言，所以我对他了解也不多。徐志摩的评语说是“笔懒入骨的太侔”，确实刻画出了赵的性格。一九四四年左

右，在昆明我跟先生谈起过赵太侔。先生认为赵还是一个有识见的人，虽然先生的原话我已记不起来，但是这个意思保管没错儿。

赵太侔夫人俞珊，是一位著名的、卓越的戏剧表演艺术家。俞珊曾经亲口对我说过，赵答应了她的一个条件——从事戏剧工作，她才跟他结婚的。就同意俞珊演戏这一点来看，后来的事实证明赵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的。这真是十分有意思。赵本来是一个到美国去学戏剧的留学生，俞本来是在田汉的南国社演《莎乐美》出名的演员，两个人结婚还得先订立这么一个契约。不过这也足以说明俞珊这个人是真心向着戏剧艺术的。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北平艺专迁到庐山牯岭，不久战事吃紧，一九三八年初又迁到湖南沅陵。在沅陵，俞珊带领我们艺专的几个同学演了一出新京剧《新雁门关》。这出戏是田汉的新作，写的是大敌当前，两位将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团结御侮的故事。阳翰笙同志在《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中说：“田汉同志忍受着生活上的困苦，冷对着反动派的诽谤，一直紧握笔杆，源源不绝地创作出鼓舞民心士气的新型的戏曲作品：《土桥之战》、《新雁门关》、《江汉渔歌》……等十多部大戏；……他为我国的戏曲改革铺垫了一块又一块基石，有力地推动了戏改运动，为我国悠久的戏曲传统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命。”据俞珊对我说，田汉为了赶写剧本常常是彻夜不眠。俞珊为了把田汉的剧本搬上舞台，也是倾尽全力的。她跟我们一起排戏，从来不知道疲倦。《新雁门关》在沅陵唯一的剧场的演出是成功的，整个剧场座无虚席。剧本的作者是田汉，主要演员是俞珊，舞台美术以至桌围椅披的图案设计是庞薰琴先生。当时沈从文先生也在沅陵，他看了我们的演出，并到后台来祝贺我们演出的成功。

俞珊本来是一个著名的话剧演员，她后来更加热爱传统的戏曲——京剧和昆曲。她接受传统，又锐意革新。后来她到重庆，想

借章士钊的帮助创办中国乐剧院来作改革京剧的实验，但未能成功。解放后，俞珊的弟弟黄敬（俞启威）任天津市长，她也到了天津。听说后来她死在北京。俞珊，这个表演艺术家所走的道路是有代表性的。既接受新形式，又热爱传统戏曲艺术，还要谋求革新。传统戏曲艺术的程式，由成熟的表演艺术经验凝聚而成，它里面蕴藏着艺术家的艰苦劳动和巨大功力。以为程式只是一种套子的人永远不能获得程式。

现代中国的美术家，譬如画家，既学习西洋画的技法，学习素描，又要掌握中国画的笔墨。称得上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现代中国的学问，必定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来的，一个是传统的。一多先生的创作和学问，我以为都有两个来源。先生的《死水》和《红烛》，当然是新诗。但那样讲求格律，正是接受传统的一种表现。徐志摩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在北京《晨报》副刊《诗刊》第十期上发表的《诗刊放假》一文中说：“我们干脆承认我们是‘旧派’——假如‘新’的意义不能与‘安那其’的意义分离的话。想是我们的天资低，想是我们‘犯贱’，分明有了时代解放给我们的充分自由不来享受，却甘心来自造镣铐给自己套上；放着随口曲的真新诗不做，却来试验什么画方豆腐干式一类的体例！一多分明是我们中间最乐观的，他说：‘新诗的音节……确乎有了一种具体的方式可寻。这种音节的方式发现以后，我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这在新诗的历史里是一个轩然大波。这一个大波的动荡是进步还是退化，不久也就自有定论。’”徐志摩说创作新诗而又甘心套上自造的镣铐，一多先生说是进步还是退化，自有定论，我以为这都说明他们的新诗是承袭传统，脱胎于旧，由旧变新的。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一多先生投身民主运动之后，罗隆基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

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王康著《闻一多传》第357页）“善变”、“三变”、“四变”等等，语含贬意。这也正说明罗隆基并不真正了解一多先生的转变。这是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合乎规律的转变，怎么会有“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闻一多先生自己说：“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我对一切旧的东西都反对，希望最好一点也不要留。……这种极端的感情，也许是近二十年来钻进旧圈子以后的彻底的反感，说不定过分了一点，但暂时我还愿意坚持我的意见。”（《论文艺的民主问题》，载一九四七年《文汇报》）喜欢走极端，正是倾向革命的一种表现。然而谈到旧艺术，他并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分析的。先生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为“新中国剧社”来到昆明而写的《“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吧》一文中说：“旧剧本是人民的艺术，至今也还是最忠实于人民的一种艺术形式。惟其如此，所以它有着人民的种种优点，而不可讳言，也有着人民的弱点。这弱点，概括的讲，就是人民的落后性。（被愚弄压榨了几千年的人民，叫他怎么不落后呢！）”

一九四〇年，先生在云南晋宁，利用休假之便研究诗歌、舞蹈、戏剧等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这时我给先生写信请益，他在给我的回信中谈到古代器物上的纹样问题。他说一般所谓几何花纹，实为绳纹。汲水的器物本用绳络以便于提携，后来制为陶器，已不需结缀绳络，人们仍要求绳络的纹样以为装饰，这是由于实用的意义虽不复存在，而审美的心理尚不可免。可知艺术的产生始于社会生活有了余裕。先生论证绳纹，不仅有出土文物为证，而且有古代载籍为据。他举出《论语·阳货》“予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为例证，说：“系匏瓜，盖谓络缀之以为樽。”又举出《庄子·逍遥游》为例：“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络）以为大樽？”司马彪注：“虑犹结缀也。”成玄英疏：“虑者，绳络之也。”先生说，考察艺术的起源及发展历史，读书与考古二者不可偏废，比较起来，读懂古书尤为重

要。可是在信中他又错误地谈到用唯物史观来解释艺术的起源不免失之偏颇。他在《匡斋尺牍》中谈到《三百篇》时说：“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这意思也是说唯物史观与非唯物史观都不能解释文艺。文艺简直神秘得很。先生转变之后，终于服膺唯物史观。朱佩弦先生一九四六年在《国文月刊》上发表悼念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中说：“近年他又注意整个的中国文学史，打算根据经济史观去研究一番，可惜还没有动手就殉了道。”

一九四三年，我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读书。秋季开学后的一个晚上，先生在中法大学讲演《诗与批评》，我去听讲了。听讲的人真多，偌大一个大教室，挤得满满的。这次讲演中有一句话说是“拉着诗人的鼻子走的方式并不是好的方式”，很可以代表他当时的思想。他认为“诗是应该自由发展的”。这正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晚会上，先生当众清算“自命清高”的思想，说：“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而深刻的转变。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先生牺牲前一个多月，他在联大剧艺社告别昆明的会上致词说：“目前一切为了民主，戏剧自然也要为民主，否则我们确乎没有闲空儿来谈什么戏剧的。”

先生寻求真理，经过曲折的道路，艰苦的历程。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他喜欢读的书当中有一本是弗洛依德（S.Freud）的《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英文本的。用精神分析的学说来解释文学现象，总不能说是找到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先生给我们讲《诗经》，真是把那些诗篇都讲活了，虽事隔已逾四十年，情景仍历历如在目前。据佩弦先生说：“他常说笑话，说他研究《诗经》，越来越‘形而下’了。”例如他讲《卫风·芄兰》“垂带悸兮”，腰间垂

下来的带子在晃动，就说这是情诗里歌咏性生活的句子。

我到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一开始先生就教导说，要读懂古书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于是我选了语言文字专业（那时叫语言文字组）。郭老在《闻一多全集序》里说：“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承继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确实如此，先生对古书的训解，是十分谨慎的。例如他对《召南·摽有梅》“求我庶士，适其吉兮！”的“吉”字的解释，先引证林义光的《诗经通解》：

林义光曰：“今读为堪，堪字通作钱，昭二十一年《左传》‘王心弗堪’，《汉书·五行志》作‘王心弗钱’，孟康曰‘钱，古堪字。’又《说文》引《书》‘西伯既钱黎’，《尔雅》郭注引《书》作‘堪最黎’。钱亦后出字，古文省借宜作今也。古金文伯作白，仲作中，祖作且，锡作易，并是其例。首章‘迨其吉兮’，言于众士之中求吉士而嫁之，此章则已以失时为惧，故曰‘迨其堪兮’，言无有可嫁者即嫁之，不暇审择也。”

先生肯定了林说，又进一步作出了新的解释：案林读今为堪，是也，惟首章之吉既谓吉士，《野有死麕》“吉士诱之”，《卷阿》“王多吉士”，《书立政》“庶常吉士”。则二章之堪亦当谓堪士，核诸词例，最为显白。《吕氏春秋报更篇》“堪士不可以骄姿有也”，是古有堪士之语。堪、能义近，堪士犹能士也，《荀子王霸篇》“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韩非子说难篇》“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士〔今作仕，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索隐》改〕之所耻。”

“迨其堪兮”，犹言庶几此所求得之士为堪士尔。《传》误读今如字而训为急辞，林氏辨之审矣。然林氏读今为堪，而释之曰“有可嫁即嫁之，不暇审择”，则是名虽易《传》，而实从之，宜其进退失据，不能自圆其说也。后来，先生又进一步修正自己的说法。

《周颂小毖篇》“未堪家多难”《传》曰“堪，任也”，动词堪训任，形容词堪亦训任。《吕氏春秋报更篇》曰“堪士不可以骄恣有也”，堪士即任士。《吕览》上言堪士，下即叙鞅桑饿人赵宣孟事，鞅桑饿人谓灵辄，正后世所谓任侠之士。《墨子经上篇》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庄子·秋水篇》曰“任士之所劳”。《邶风燕燕篇》“仲氏任只”，《笺》曰“任者，以恩情相亲也”，《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观其廉任”，卢注曰“任，以信相亲也”，《史记·季布传》“为气任侠”，《集解》引孟康曰“信交道曰任”。朋友以恩信相亲曰任，亦曰堪，男女以恩信相亲亦然，《吕览》堪士谓朋友，《诗》堪士谓男女，名之所施虽异，义则一而矣。

先把堪士解释为“能士”，继又易为“任士”。先生治学是谨慎的，正如他自己在《匡斋尺牍》里所说“我仍是极乐意耐烦的，小心的，客观的搜罗证据”。在这个基础上，他总是力图修正旧说（包括他自己的），创立新解。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转变，一种值得称颂的转变。

在我跟随先生的十年当中，先生完成的伟大转变，我是深刻地感到了的。一九三六年，先生到河南安阳调查发掘甲骨情形，还到过洛阳。他回到北平以后，对学生说：“当然，中国只有抗日才有出路，同学们的运动是无可责备的。但是我这次路经洛阳时，才觉得在那里政府是有一点准备，和在北平所见的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对政府完全失望。”（据《年谱》）先生在艺专的英语课的课堂上对我们一班同学说：“有人倡议学生从军抗日，但是一个学生的价值远高于一个兵士的价值。学生报国应该从事更艰深的工作才对。”他还谈到龙门石窟，对那石窟雕像赞不绝口，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之情溢于言表。经历了抗战，亲身体验了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他的“学生高于兵士”的思想改变了。一九四四年，先生兼任昆华中学国文教员，每月得一石米和一点薪金。他为了维持我的生活，要我替他修改中学生的作文卷子，从他那一点薪金中分

出一点儿钱给我作为报酬。就在西南联大校门外的马路上，他看到马路边儿的那些饿死的“壮丁”，每次都跟他自己受刑一样。他认识到那死于沟壑的青年农民，才是中国的脊梁。他说：“那青年农民的双手，是可以叫大地变色的双手呀！”（马识途《时代的鼓手——闻一多》）他给中学生出的作文题目《病兵》，就是为此有感而发。这作文我批改过。

一九四五年，为欢送毕业同学在龙家公馆的厅堂里举行联欢会。先生在会上愤怒地控诉了反动派，彻底认识了那样的政府是不能领导人民抗战，只会压迫人民的；所以他说当务之急在于争取民主。先生牺牲前的几年，他总是设法接近群众。新中国剧社的除夕晚会他参加，李公朴的北门书屋楼上的时事座谈会他参加，彝族舞踊的演出他赞助、支持。这是只就我也参加了并亲眼看见先生参加的活动而说的，此外他还参加了许许多多进步活动。这些活动都是带有危险的，新中国剧社的戏，彝族的舞踊都曾被禁演过。那时张光年同志就住在北门书屋（门市部对面的楼上），他跟我说夜间听到汽车急驰而来的声音，便不由会想到有可能遭到反动派的追捕。先生到这些地方去，明知道有危险，然而他对自己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了。一九四五年“一二一”学生运动，为了争民主、反内战，抗议反动派的镇压，罢课完全是正确的。到后来由于过“左”情绪的干扰，有一些人要无限期罢课，这就对革命不利了。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决定在适当的时机复课以利继续斗争。但是有些受了过“左”情绪影响的、愤怒的同学，“复课”的话是听不进去的。为了商议劝导同学复课的事，一天晚上，学生会的、罢课委员会的负责同学都挤到吴晗先生那间小小的宿舍来了，先生也来了。大家感到那些同学一时难以说服。先生满脸通红，激动地说：“我宁愿叫他们打死，我也要去劝说他们复课。”为了革命利益，先生已经准备好随时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生

命。

先生的理想是到获得解放的人民中间去生活。他跟我们联大新诗社的同学说：“何其芳是快乐的，因为他已经生活在人民中间了。”为了这崇高的理想，先生献出了生命。我没有忘记，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先生和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末了再补叙几句。先生在《匡斋尺牍》中说《诗·芣苢·卷耳》的“采采”，“全是形容词”。又说：“‘采采芣苢’若依毛郑以及薛君读‘采采’为动词，无论《三百篇》中无此文法，并且与下的‘薄言采之’意义重复，在文法上恐怕也说不过去。极明显、极浅近的一件事，不知道为什么向来没有有人说破。”不久，丁声树先生发表了《诗卷耳芣苢采采说》，就把这件事彻底说破了。
前面提到一多先生认为赵太侔是一个有识见的人。解放前，赵两度任山东大学校长。1984年4月，庞薰琴先生跟我谈起赵的一件事。他说解放前，他的家住在上海。赵从青岛到了上海，就住在他家。赵对他说，青岛解放的时候，自己决心把山东大学好好儿地交给人民，交给接管的同志。据说当时接管山东大学的有一位是罗竹风同志。罗我认识他，因此庞先生希望我有机会把赵太侔那时的心意对罗说一说。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没有见到罗，所以也没有跟他说，就写在这里吧。这件事说明，一多先生对于人的观察也是深刻的。

大将军霍光，新坐法固中郎人也。竟陵侯臧宣是戚属也。法固中郎人臧宣坐法固，而取封号，其词：“臧宣同帕封者，臧天令曰：‘臧宣，臧宣者，臧宣也。’”

沈尹默与章士钊

。臧宣坐法固，而取封号，其词：“臧宣同帕封者，臧宣者，臧宣也。”

江 东

一九一三年春，沈尹默受北京大学之聘，从杭州到北大文科任教，当时，国学宗师章太炎门下的新派渐起，在北大教员中，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黄侃等，都是新派代表。沈尹默与沈兼士是同胞兄弟，因此，也就被认为是章氏门生了。新派是反对袁世凯的，但它不同于一个政治集团，戳动不了袁世凯这“庞然大物”。一九一四年，章士钊在日本办起了《老虎报》，行销日本、东南亚，并直达欧洲，影响深远，声援了国内的反袁运动，得到国内先进人士的赞赏。章士钊与沈尹默于一九〇七年在杭州时已有交往，诗词互相唱和，在当时的反袁的共同目标下，隔海不隔音，思想上更趋密切。

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从法国留学回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教授沈尹默推荐上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不久，章士钊亦到北大任图书馆馆长。陈独秀与章士钊原是故友，早在一九〇三年于上海共同创办《国民日报》，酝酿革命思潮；沈尹默与陈独秀早在清朝末叶，同在杭州执教时又是至好。其时，陈、章、沈三人同在北大工作，彼此探讨学术，交往甚密。先后到北大任教者，还有胡适、鲁迅、刘半农、高一涵、沈士远、陈大齐、周作人等名流学者，济济一校，北大声誉，名震南北。

章士钊对古典文学研究尤其在诗词方面造诣很深，名扬全校。沈尹默在北大讲授《诗经》，其古诗词作品，深为章士钊所钦佩。两

人又兼长书法，时以佳作互赠留念。两人在文学研究方面，都有广博素养，但在见解上则有不同之点，且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当时的北大，提倡学术研究自由，学术观点的矛盾，无损于友谊。章士钊在北大仅一年多，即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坚持他一贯反对白话文的主张，继续维护旧学。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在段祺瑞执政府中担任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时称“老虎总长”)，烜赫一时，并利用一时权势，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造成“三一八”惨案。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点名指斥提倡新文化运动者为“反动派”、“落伍者”。沈尹默和北大部份教授是坚决倡导新文化教学的。章士钊冒天下之大不韪，从政治上镇压文化运动。这次，大家感到“老章又反叛了。”(当时流行口语)，对章士钊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这是一个涉及到新文化思想的发展与新文化被扼杀的关键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了。从这时起，沈尹默公开指出章士钊是个罪人，要天诛地灭的，声明与章士钊断绝了朋友关系。

沈尹默的民主思想，深孚众望，为人谦虚正直，素为同道赞扬。一九三二年，沈尹默被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这是试行大学区制，当时，由北平、天津等地几所国立大学合并成立的综合性大学。)当时的北平大学，继续提倡学术公开探讨，学校不加干预。实际上却受到上级很大的政治压力，沈尹默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学者，他坚决维护学生言论自由，反对上级密令抑制学生的各种进步活动。在政治势力的高压下，沈尹默终于不惜辞去北平大学校长职务，回到上海，以鬻书自给。

此时，章士钊在政治上早已失势，在上海担任律师。章对沈尹默辞去校长的果断行为，表示十分敬佩，又感到自己过去一段的言行问心有愧。他曾主动致函沈尹默，辨证了过去的教训，抒发对故友的情切，信中这样写道：“过去骂我者是爱我，过去爱我者是害我，历史教育了我。现在您是作对了”(指沈辞去北平大学校长)。

原信是文言，此乃根据沈老夫人褚保权讲述记录。)沈尹默读章信后，感到自己处境不好的时候，章士钊却能这样情意拳拳，自勉勉人，也就消除前怨，从此又复诗词书信来往。

抗日战争时期，沈尹默居重庆歌乐山石田小筑。一九四一年，章士钊在旅居桂林时，曾遥寄重庆沈尹默词一首：

玉楼春 雨阶怀尹默

几多词句情依旧，析尽风林无限愁。只缘知律眼前稀，说与前山客独秀。
别来总是愁时候，纵有燕翎书不就。一帘花雨独思君，准问东阳先问瘦。

沈尹默在客居中喜读章诗，战乱中故友情深，十分快慰。他细辨再三，诗兴俄起，一连回赠和诗两首(第一首原稿残缺，无法查明)，第二首题为《再答行严》，诗曰：

风雨高楼有所思，等闲放过百花时；西来始信江南好，身在江南却未知。花光人意日酣酣，容我平生士不堪；说着江南放慵处，如君能不忆江南。

两老诗词，朴实无华，简洁明白，不谈风物，不涉政事，思友情深，怀乡心切，彼此同病相怜，互诉情怀。接着，章士钊又函寄沈尹默一词作：

念奴娇 怀重庆诸友

漓江西上，是几时不见，渝州烟雨。闻说长阴洞里，贼火今年如许。四面山明，一肩人瘁，人被山留住。却怀诸友，此时分散何处？谁管独秀峰高，延年魂在，读得书如故。作客漫将诗骨换，稍稍寻声按谱。潭水深汪，东阳瘦沈(指尹默)，谁与商今古。开缄试看，渠依新学言语。

词中回忆了过去在北京大学时能与沈尹默共商今古，而在战乱中，孤寂无知好，“谁与商今古”呢？怀念之情，溢于言词。沈尹默给章士钊的书信是用白话文写的，章士钊原是坚决反对白话文的，认为